

《瘞鹤铭》的宋代研究述评 及其几点设想

——以一新见碑别字为发端

王福生 马涛

摘要

2013年,江西省抚州市出土了一方宋故承奉何君墓铭,考据铭文发现此方墓铭撰写者为南宋绍兴年间的进士黄允,墓铭言辞流畅细腻,书法功底颇深,具有很高的史料、艺术价值。细致考究铭文,见其中有一“爽”字,写法甚为独特,当为碑别字无疑。又遍查文献发现,其竟与南朝著名石刻《瘞鹤铭》中“爽”字写法别无二致,忖度这一“巧合”,或与宋代金石学界对《瘞鹤铭》深入研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故作此文做一简要回顾并附几点设想。

关键词

《瘞鹤铭》;研究述评;金石学;墓铭;碑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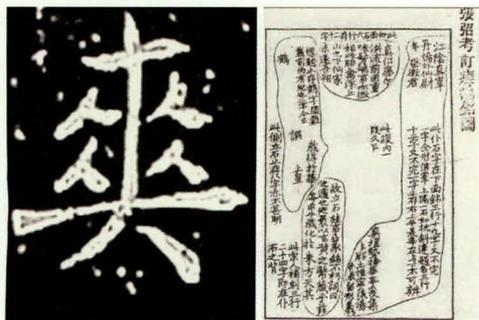
《瘞鹤铭》,我国最著名大字摩崖石刻之一,内容是一篇纪念亡鹤的悼文,瘞为埋葬之意,因此瘞鹤铭就是埋葬亡鹤的铭文。原刻于镇江焦山西侧临江的崖壁之上,大约在唐代后期或稍晚,不堪江水拍击(或言遭到雷击)坠入江中,断裂残损,入宋以后,残石才不断被发现并打捞上岸。直至庆历八年(1048),镇江太守钱彦远(字子高)将打捞上的一块《瘞鹤铭》残石,置于焦山碑林之中,从此《瘞鹤铭》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其铭文书写顺序与古时一般碑刻不同,一反常态地采取从左向右的方向阅读。文风淡雅飘逸,书体采用楷书,却也带有明显的隶书、行书意趣,文字大小不拘于定式,于摩崖之上挥洒自如,仙气盎然,是中国书法艺术中承前启后的杰出代表。历史上从未有一块石刻,像《瘞鹤铭》这般,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在千年时光里时隐时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令无数人为之痴狂。

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就对《瘞鹤铭》推崇备至,作诗言道:“大字无过瘞鹤铭,小字无过遗教经。随人学人成旧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从此,大字之祖——《瘞鹤铭》的美誉传扬天下,其艺术价值也得到普遍认可和推崇。而在我国金石学史中,《瘞鹤铭》更是地位显赫,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瘞鹤铭》北宋主要研究述评

《瘞鹤铭》虽然在唐代就已经出水并被妥善保存,但坠江之前的全本铭文一直没有发现,仅在唐代地方志《湖州图经》^[1]中有所提及,在学界亦未能受到重视,因此谈不上研究,更与金石学无关。

由于《瘞鹤铭》只题撰写者字号未写姓名,只注干支纪年不书朝代,且刻石破坏严重,铭文残损不全,故入宋以来,尽管众多学者对



左 / 图1 《宋故承奉何君墓铭》中之爽字
右 / 图2 《张昭考订瘞鹤铭图》



图3 《瘞鹤铭》

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但众说纷纭，各种观点甚嚣尘上，莫衷一是。最早把《瘞鹤铭》作为研究对象^[2]的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金石学家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卷十记载了其对《瘞鹤铭》的认识与研究：

瘞鹤铭题云：华阳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

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只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几”而已。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也。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的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3]

欧阳修认为《瘞鹤铭》是“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的宝物，提出了关于《瘞鹤铭》作者是唐人顾况的假设，但研究尚不够深入，叙述甚简，对其年代、作者亦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对后世研究的启发意义不能忽视。之后，赵明诚就在他的《金石录》卷三十^[4]中对欧阳修的观点提出了异议：“《瘞鹤铭》题华阳真逸撰，真逸未详其为何代人。欧阳公《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余徧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阳山人尔。不知欧阳公何所据也。”赵明诚在此对欧阳修有关《瘞鹤铭》作者为唐人顾况的假设，提出了批驳，谈及他遍查史料，亦没有发现顾况有“华阳真逸”的字号，仅有一处自称“华阳山人”而已，对欧阳修认为“华阳山人”就是“华阳真逸”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而赵明诚的这一批驳，算得上是有的放矢，有理有据，即便不谈孤证不足以采信，仅欧阳修主观地把“山人”等同于“真逸”，就不够有说服力。

此外，黄庭坚也对欧阳修的部分观点进行了评价，还提出自己的看法^[5]：

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瘞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邪？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真碑》得《瘞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

《佛遗教经》一卷，不知何世何人书，或曰右军羲之书。黄庭坚曰：吾尝评此书，在楷法中小不及《乐毅论》尔。清劲方重，盖度越萧子云数等。顷见京口断崖中《瘞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以此观之，良非右军笔画也。若《瘞鹤碑》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如欧薛颜柳数公书，最为端劲，然才得《瘞鹤铭》仿佛尔。唯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石玉间。

首先他对《瘞鹤铭》的书法造诣推崇备至，认为作者当为王羲之。并在预设《瘞鹤铭》是王羲之真迹的前提情况下，对《遗教经》进行了鉴定，认为《遗教经》并非羲之所作。而且还拿《瘞鹤铭》与欧阳询、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的作品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只有颜真卿的《宋开府碑》有《瘞鹤铭》四五分意境的结论。可见黄庭坚对《瘞鹤铭》的评价之高，但是他认为《瘞鹤铭》为王羲之

[1]按：唐孙处玄所撰《润州图经》早已失传，仅在新、旧《唐书》和后世的志中可见引用的佚文著录。

[2]按：在欧阳修之前刁约、邵亢、张子厚等人虽对《瘞鹤铭》有过相关记载，但仅限于采用写本或拓片对铭文的复原，未有深入的研究，故本文不引其为研究者，在此注明。

[3][宋]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校注：《集古录跋尾》卷十，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95-196页。

[4][宋]赵明诚撰，金文彬校正：《金石录校正》卷三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1页。

[5][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97-98、112页。

[6][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56-157页。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2768页。

[8][清]谢昉等：《江西通志》卷八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五一五册，第745页上栏。

[9][宋]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6-1107页。

[10]按：白筒指弹劾官员的奏章。

[11]秦公、刘大新：《广碑别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264页。

[12]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二册，第146页。

[13][清]王原祁、孙岳颂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八二三册，第43页下栏。

[14]按：长睿即黄伯思的表字。

[15]刘佑平：《中华姓氏通史——黄姓》，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16]同注[11]。

所书的依据，仅仅在于《瘿鹤铭》书体与王羲之“势若飞动”、“瘦健清拔”的书法风格相契合。但他这种认知，仅以书风入手，不以缜密考证为据是不可取的，于后人来说，仅为一家之言耳，难以尽信。

对诸家观点进行比较后，个人认为北宋时期对《瘿鹤铭》研究最为深入的当为黄伯思，其著作《东观余论》卷下^①言：

《瘿鹤铭》，资政邵公亢，尝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阙之，故差可读，然文首尾，似粗可见，虽文全亦止此百余字尔。而欧阳文忠《集古录》谓好事者往往只得数字，唯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矣。盖印书者传讹，误以十为百当。时所得盖六十余字，故云比数本为多。此铭相传为王右军书，故苏舜钦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鹤经，京口新传瘿鹤铭。”文忠以为不类王，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云道号同，又疑是王瓚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日真逸者，岂其别号欤？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它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四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十三年，正在华阳矣。此铭后又有题丹阳尉、山阴宰数字，及唐王瓚诗字画，亦颇似瘿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瓚书误矣。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四十九，始去会稽而闲居。则不应三十二年，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

黄伯思先指明欧阳修《集古录》记载的《瘿鹤铭》六百余字当为六十余字，接着列举文献，对《瘿鹤铭》为王羲之所书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依照他的观点，首先否定了《瘿鹤铭》是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并综合各种文献材料加以对比研究，认为《瘿鹤铭》当为南朝萧梁天监年间陶弘景所书并题刻于焦山之上。这一看法得到了后世大多数学人的肯定，直至今日依旧是对《瘿鹤铭》作者及成文年代研究的主流观点，黄伯思能在北宋后期就有如此周密的讨论、深刻的认识，殊为难能可贵。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更值得后人效法。

二、《瘿鹤铭》南宋主要研究述评

南宋时期，宋室偏安江南。与此同时，文化中心也发生了南移，而作为南方地区著名的碑刻汇聚之地，焦山愈发为文人骚客所关注，相关的研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比之北宋丝毫不落下风，但研究方法和侧重点发生了较大的偏移。与前期以金石学方法考据作者和年代为主不同，南宋时期承接了北宋末年书法理论研究的步伐，主要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瘿鹤铭》进行讨论和研究，而且大多都在《瘿鹤铭》所在的焦山碑林之中留下了铭刻，不仅给予了后人探知当世学人思想的机会，这些铭刻本身也与《瘿鹤铭》一起成为了无价的文化遗产。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陆游和他的《踏雪观瘿鹤铭》题刻（亦称《陆游焦山题名》）了。这则题刻刻于焦山西麓山道崖壁之上，楷书，共计74字，释文如下：

陆务观、何德器、张玉仲、韩无咎隆兴甲申闰月廿九日，踏雪观《瘿鹤铭》，置酒上方。烽火未熄，望风樯战舰在烟霭间，慨然尽醉。薄晚放舟，自甘露寺以归。明年二月壬午，圜禅师刻之石，务观书。

这则材料其实与《瘞鹤铭》本身的研究关系不大，但其中提供的时间信息颇为重要，“隆兴甲申闰月廿九日，踏雪观《瘞鹤铭》”即说明南宋隆兴二年（1064），《瘞鹤铭》残石虽已坠江，但在冬季尚可被看到，这于探明《瘞鹤铭》研究的历史而言作用不凡。

其次，必须提及的是吴琚对《瘞鹤铭》的关注。吴琚，字居父，是宋高宗圣宪皇后之侄，太宁郡王、卫王吴益之子，官至少师、判建康府兼留守。既是皇亲国戚、高官显宦，又是当时著名书法家，在书法艺术、理论上均造诣非常。他在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曾亲赴焦山观摩《瘞鹤铭》，并前后留存了《春游焦山观<瘞鹤铭>诗》和《焦山题名》两篇墨迹。

《春游焦山观<瘞鹤铭>诗》为摩崖石刻，行书，铭文释读如下：

昔爱山樵书，今踏山樵路。江边春事动，梅柳皆可赋。犖确石径微，白浪洒衣履。临渊鱼龙惊，扞崖猿鸟惧。古刻难细读，断缺苍藓护。岁月岂易考，书法但增慕。摩挲复三叹，欲去还小住。习气未扫除，齿发恨迟暮。华亭鹤自归，长江只东注。寂寥千古意，落日起烟雾。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吴琚春游焦山，欣赏《瘞鹤铭》的场景，表达了他观看后对《瘞鹤铭》书法艺术的无限崇拜和感慨。全诗未言明《瘞鹤铭》作者的身份，而以“山樵”指代，又言及“岁月岂易考”，这是在有意避免从金石学的角度对《瘞鹤铭》的考据，防止犯客观性错误。

《焦山题名》为纸本墨书，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行书，释读如下：

焦山题名

延陵吴居父解组襄阳。汝阴孟子开临邛常叔度。皆一时秩满。联舟东下。泊紫金山。越三日。来浮玉观新建飞仙亭。又三日。绝江而南。绍熙辛亥季秋丙寅题。

这则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新建飞仙亭”，二是时间为“绍熙辛亥季秋丙寅”，绍熙辛亥即绍熙二年（1191），也就是说南宋绍熙二年在焦山之上新修建了飞仙亭。而参考其它文献，我们知道淳熙十六年（1189），《瘞鹤铭》残石重新被从江中捞出，而就在不到两年以后的淳熙二年一座名唤“飞仙”的亭子就在焦山之上落成，这当与存放重新出水的《瘞鹤铭》残石密切相关。因此吴琚《焦山题名》虽只有区区数十字，但对于厘清《瘞鹤铭》的有序传承，有着难以替代的最大意义。

三、以墓铭碑别字“爽”发端的几点设想

2013年9月，抚州市文物工作者在紧邻崇仁县的宜黄县桃陂乡进行文物普查的过程中，征集到一方“宋故承奉何君墓铭”。因其属征集品，故而他所出的墓葬环境及其它随葬品情况均不清楚。

此方墓志呈圆首长方形，通高106厘米，宽71厘米，厚3.5厘米，青石质地。志石右侧约二分之一处向斜下方断裂成两半，所幸铭文不缺。志石（图1）上部正中阴刻楷书四行八字，笔道略带行意，铭文为“宋故承奉何君墓铭”；其下有志文共计23行，700余字，行楷，文字笔力遒劲，清晰易辨识。由于铭文体内容因与本文着重讨论的《瘞鹤铭》关系不大，故在此不做特别介绍，下面仅对与本文关系密切的墓铭撰写者黄允做一简要说明。

墓铭的结尾处记到：“门人黄允，视君为忘年，铭君之墓，非吾党之为，而谁为？”清楚地表明撰写者为黄允。而相关年代也十分明晰，这篇墓铭撰写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翻阅各种文献，其中有关黄允的记载颇多，下面便拣选数条，以期读者有一直观认识：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7]：“绍兴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癸卯……右朝请大夫黄允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允娶秦桧儿女，曹永荐用之。”

2.《清康熙修江西通志》记载^[9]：“黄允字悦道，临川人，绍兴进士。尝献美芹十策、进取四论。历官守南雄，陛辞三札，论政事得失。言甚切直，持身清廉。年未七十致仕，官至朝议大夫、临川县开国男。”

3.《宋宰辅编年录》记载^[9]：“秦桧当国柄时，听受谗间，辄以风闻即起大狱……皆是台官承桧指意，方敢上章疏。第一章带职官祠，数日间再一章落职，例皆如此……上知其然，亲擢汤鹏举为侍御史，又降诏戒谕台谏云云。鹏举首具白简^[10]，论列知太平州王珣、知宣州王铸、知庐州郑侨年……提举浙东茶盐黄允，并罢之，皆桧之亲戚门人也。由是桧亲戚门人未造论列者，皆不安迹。”

由上述几条材料，可以知道：黄允字悦道，江西临川人，妻秦氏，为秦桧侄女。绍兴年间进士，曾官至朝议大夫、临川县开国男，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后因身为秦桧亲戚遭弹劾罢官回乡。又通过这则墓铭中记载的“门人黄允，视君为忘年”，可知黄允罢官回乡后做了何家的门人，与墓主何遵成了忘年之交，关系甚为密切，故此给墓主撰写墓铭也就成了题中之义。

对墓铭考释过程中，发现在靠近结尾处记有“女一人，适进士罗爽祖母之族党也”一句，说的是墓主人的女儿嫁给了进士罗爽祖母的族人，考究文献，未见进士罗爽的任何记载，故不多言。这句话的内容对本文没有太多价值，但碑文中“罗爽”的“爽”字写法颇为独特（图2），当为碑别字无疑^[11]。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翻阅《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2]，发现其“爽”字写法竟与南朝著名石刻《瘞鹤铭》中的“爽”字（图3，图选自水前本之一的梁启超饮冰室旧藏《僧鹤洲零拓本瘞鹤铭》）完全一致，深为欣喜，又细查有关《瘞鹤铭》的研究经过，便可知道《瘞鹤铭》在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书法艺术中的地位犹如泰山北斗一般，忖度这方南宋墓铭在书法艺术上或有刻意模仿《瘞鹤铭》书体之处也不无可能。

上文回顾了这一时期有关《瘞鹤铭》的研究，加之从墓铭中发现的一个碑别字——“爽”，由此引申并加以联系考虑，就有了以下自己的几点设想：

（一）有关时代吻合的设想

1.《瘞鹤铭》在庆历八年（1048）出水后不久，为妥善保存《瘞鹤铭》，便将文字另刻了一份存于焦山浮玉岩壮观亭。后来亭毁石存，故而这一版本史称《壮观亭址别刻》。而现存《壮观亭址别刻》的左下方有米芾的两则题刻，大致内容记载了米芾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至焦山寻访《瘞鹤铭》，然而此时原石再次坠江，又时值夏季，江水高涨，故米芾一行遗憾地未能一窥《瘞鹤铭》原貌。由此我们可以知晓至迟到北宋元祐年间，瘞鹤铭原石又一次坠江沉水。

2.《佩文斋书画谱》^[13]引明人顾元庆《瘞鹤铭考》记载：

宋马古洲子严云：予淳熙己酉岁，为丹阳郡文学。暇日游焦山，访此石刻，初于佛榻前见断石乃其篇首二十余字，有僧云，往年崖间震而坠者。予亦信然。遂挈舟历观崖间，尚余“兹山之下”二十余字，波间片石倾侧。舟人云，此断碑水落时，亦可摹搨。子因请于州将龙图学士，张子顾出之。张欣然发卒挽之，既出。则“甲午岁”以下二十余字，偶一卒复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觉隐指如是刻画，遂并出之。疾读其文，则与佛榻所见者其文一同，持以较之“第阙”二字，而笔力顿异。乃知前所见者，为寺僧所给耳。近观陶隐居诸刻，反复详辨，乃知此铭真陶所书，前辈所称者众矣。惟长睿^[14]之说，得之此不复辨。

由此我们知道《瘞鹤铭》第二次被发现并挽出的时代为南宋淳熙己酉年（1189）。

3. 而上文有关黄允的生平事迹的说明已经很清楚了,黄允为绍兴年间进士,并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监公事,但不久秦桧死,因其与秦桧关系密切而遭到罢官,长期赋闲。我们有理由相信,从罢官一直到开禧元年(1205)这四五十年里,黄允大多数时间应该是在家乡临川度过的,由此才成为何异家的门人并与墓主人何遵成为忘年之交。他就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瘞鹤铭》残石重新出水后的十数年里从事金石学研究。

(二)有关亲缘、地缘巧合的设想

1. 黄允籍贯江西临川,而墓主何遵为江西崇仁人,临川与崇仁南宋时皆为抚州所辖(今亦然),因此我们将黄允的主要活动范围视为抚州及其周边也是合情合理,无可指摘的。

2. 据《清雍正修福建通志》卷二十五所载“建阳县宋知县事”的名单里,黄允赫然在列,虽然内容甚为简要,具体年代未载,但确定黄允曾任职建阳知县还是没有疑问的。

3. 黄伯思,字长睿,北宋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秘书郎,著名金石学家,对《瘞鹤铭》的考释前文已有详细介绍。黄伯思及其家族,籍贯福建邵武军,而邵武军与建宁府下辖的建阳县接壤,与抚州也仅仅相距数十公里。尽管古代交通不便、安土重迁,但这种距离的阻隔,也不能对三地之间的交流造成影响。

4. 历史上,黄氏甚为显赫,仅在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曾对黄氏的源流做过探讨,其宗支众多,历代名人辈出,仅福建的黄氏宗支就至少有十个之多,而邵武黄氏在黄氏中也较为显赫,是赣、闽两地黄氏家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15]。众所周知,宋代时,家族间的血脉联系之紧密要超今日想象,而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在宗族内部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黄允身为黄氏家族的一分子又长期在抚州居住、建阳为官,倘若说他与邵武黄氏没有往来,也一定是立不住脚的。

5. 众所周知,秦桧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权相,也是著名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自成一派,为后世所谓的“宋体字”的滥觞之一,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极高。早在南宋秦桧生活的年代里,他的手迹就已是洛阳纸贵、一片难求。而作为秦桧的侄女婿,又是因为与秦桧过从甚密而遭到罢官的黄允,对书法艺术也一定也颇有研究,我们从这方墓铭的书体也可见一斑。

故而基于以上论据,我们不难得出:黄允在罢官闲居期间,曾受到黄伯思金石学研究、秦桧书法的影响,对《瘞鹤铭》做过一些探查或关注,才会在自觉不自觉之时,将《瘞鹤铭》中的书体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仅仅在“爽”碑别字就多达二十多种^[16]的情况下,偏偏就会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域出现如此之“巧合”。

结语

本文以一个碑别字“爽”为发端,旨在探索《瘞鹤铭》在宋代的相关研究,并把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运用其中,给古代石刻研究,尤其是《瘞鹤铭》这样的著名石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但由于个人学力不足,且文献材料记载局限,而此方墓铭有关撰写者黄允的信息也不多,缺乏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支持,故而本文中自己的观点多数基于逻辑上的推导,尚属设想之层面,还需日后进一步搜集材料,并期待发现新的相关考古材料以飨后人。